

1940年澳门难民赈济动员始末

林洪威

摘要：1940年中山县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战时“中立区”澳门。在内外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澳门成立了“澳门华侨赈济会”，组织澳门各界团体、普通群众，联合香港侨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赈难救亡运动，成功救助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同胞。港澳联动救助内地难民的历史事实，揭示了港澳地区民众在战场之外驰援祖国抗战的独特路径，树立了抗日救国的典范。

关键词：抗战时期澳门 赈难救亡运动 华人团体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澳门政治环境特殊，未受战祸侵扰，成为战争难民的“避难所”。据统计，澳门分别在广州、中山和香港沦陷时大规模收容难民，挽救了大量的生命。^①澳门人民热心从事赈难救济工作，不仅在抗战中扮演

着“国际避难所”的重要角色，还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稽查学界关于澳门抗战期间赈难救亡运动的成果，发现相关研究大体从救亡团体和救济实践两方面展开。救亡团体研究方面，澳门回归前，黄哲军^②和黄慰慈、陈立平^③分别撰写论文和专著，介绍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和澳门四界救灾会战时开展救亡工作的光荣事迹，何山进一步讨论了澳门四界救灾会跨地域的支援情况，^④娄胜华从澳门社团发展沿革的角度出发，将抗日战争期间涌现的新团体称为“救亡赈难团体”，认为该类团体是民族危机下社团的变体形态。^⑤江淳拓展了参与救亡的社团组织的研究范围，从澳门鲜鱼行、上架行会馆、澳门柿山结义堂等行会视野呈现了赈难救亡运动的全民性。^⑥救济实践方面，杨仁飞从澳

作者简介：林洪威，澳门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① 据相关统计显示，澳门在1930年总共有157 175人，1940年暴涨到将近40万人，大多数人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难民。因为战争期间人口流动很大，1940年澳门人口的数量估值也千差万别。C.Duncan估计1940年前后居澳人口峰值为50万~60万人。C.Duncan,R.D.Cremer,*Development of Macau's City Landscape* (Macau),H.K:UEA Press Ltd.1987,pp.79.古万年、戴敏丽则估计，澳门在1940年大致有374 737人，如今主流文献更采信古万年、戴敏丽的说法。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101页。

② 黄哲军：《光荣和坎坷的历程：记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澳门日报》，1985年12月22日-25日，分4期。

③ 黄慰慈，陈立平：《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澳门：星光书店，1990年。

④ 何山：《热血丹心赤子情——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服务二队在鹤山》，《岭南文史》，1999年第S1期，第55页。

⑤ 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74页。

⑥ 江淳：《乱世仁心——抗战时期澳门华人社团赈济救难活动》，《史料与视角：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传统与创新》，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19年，第302-315页。

门华人社会的整体意义上呈现澳门开展救济工作的全貌，^①钟子程从华人团体、澳葡政府和教会角度说明本地团体救济难民过程的联动性，^②李任欣从救济款筹集的角度出发，交代了赈难救亡运动的资金流通过程。^③

此前学者偏好从抗日战争的全局视角出发，展现澳门赈难救亡运动长时段的发展动向，一般将澳门救济中山难民的活动视作广州与香港陷落之间难民救济的“插曲”^④，或将1940年中山沦陷一事视作澳门赈难运动走向沉寂的标志，^⑤忽视了该救济活动在组织动员上的示范意义。本文将依托《华侨报》的有关记载^⑥，从1940年澳门救济中山难民的活动出发，揭示救济过程中救亡赈难团体到原生社团、普通民众的动员结构的完备性，反映港澳华人协同赈难，共赴国难的历史事实，展现出“特区抗战”的独特路径。

一、善业津梁：闽澳华侨赈济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闽澳华侨赈济会，原名“闽澳华侨济难会”，是澳门爱国侨胞为救济中山难民成立的

“救亡赈难社团”。闽澳华侨赈济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华人开始整合赈难资源，在难民救济工作上形成统一的意愿和领导。

（一）组织架构与沿革

1940年3月5日，日军进犯中山，在唐家湾与香洲登陆，致使大批难民涌入澳门。^⑦危急情况下，莲峰庙义学率先组织难民收容工作，腾出庙宇后殿供难民栖身。^⑧3月7日，镜湖医院、同善堂与中山海外同乡济难会分会、澳门救济难民委员会也开始自发地组织施粥、收容、筹款赈难工作。^⑨由于难民基数大，流动性强，零星的施救如杯水车薪，澳门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等团体召开大会，商讨难民救济方法，终在3月10日成立闽澳华侨赈济会（初名“济难会”），负责领导救济工作；3月12日，订立《闽澳华侨济难会章程》。

分析《华侨报》上有关首次大会及《闽澳华侨济难会章程》报道可知，一方面，闽澳华侨赈济会为统筹全澳难民救济事务，整合了澳门华人团体及业界名流的意见，建立起一套正、副主席领导，以“会议制”为组织形态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为提升决策效率，规范日常管理，闽澳华侨赈济会增设执行委

① 杨仁飞：《澳门近代化历程》，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38-246页。

② 钟子程：《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难民救济工作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③ 李任欣：《葡据时代澳门华人社团研究（1840—1940）》，苏州科技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

④ 吴志良，娄胜华，何伟杰：《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八卷：革命、战争与澳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2页。

⑤ 冯翠：《抗日战争专题研究：抗战中的澳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74页。

⑥ 《华侨报》创办于1937年，是澳门抗战时期就开始发行的华文报纸之一，该报章不仅销路广、影响力大，以社会时事为主要报道题材，而且持续、深入地发布了澳门抗战期间赈难救亡运动的相关信息，是可靠的原始材料。王忠，卢雪纯：《抗战时期粤剧在澳门的传播——以报纸广告为中心的考察》，《澳门研究》，2022年第116期，第46-57页。

⑦ 《日进犯中山 华军正坚强抵抗 村落被毁 难民数万避入澳门》：《申报》，1940年3月6日，第23707号，第3版。

⑧ 《拨天后殿作收容所》：《华侨报》，1940年3月6日，第5版。

⑨ 《难民嗷嗷待哺 善长仁翁速起急赈 莲峰庙观音堂镜湖医院已无地可容 殷商黄汉兴高可宁均分日举行施粥》：《华侨报》，1940年3月7日，第5版。

员，负责日常事务的协调与决议，还按照“总务”“财政”“劝募”“宣传”“管理”“卫生”六大门类，^①将赈难事务职能化、部门化、条理化，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保障了团体内部分工明确、高效有序，救济工作的效率显著提高。

闽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重心随着战局的变动而逐步调整。1940年3月10日到4月8日，日军在中山城内扫荡中国军民，四处烧杀抢掠，大批难民滞留澳门，该阶段闽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重心为“安置难民”。同年4月后，中山前线战事稍息，闽澳华侨赈济会于4月8日宣布遣返少壮难民，常务会议在同一天决议不再收容难民。^②半个月后，《华侨报》开始连续报道闽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总结”（共8期），^③难民数量也逐渐减少，^④标志着闽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重点由“救济难民”转向“遣返难民”。闽澳华侨赈济会计划在6月10日以前完成难民疏散工作。^⑤该计划未受实控中山县的日伪当局阻挠，1940年6月8日，汪伪政府办的《中山日报》指出：“本市自六一延长夜间通行时间后……各地民众连日归来故土，重理故业者

比前倍众。”^⑥6月25日以后，闽澳华侨赈济会将余下2741名留澳难民交由中山海外济难会安置，标志着闽澳华侨赈济会解散，救济工作圆满完结。^⑦

（二）与国民政府、澳葡当局的关系

面对中山沦陷、日寇逼进的严峻局面，闽澳华侨赈济会不仅需要团结华人同胞，凝聚救济资源，还要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澳葡当局的关系，争取为赈难救亡运动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自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设立海外部以后，国民政府对港澳地区事务也愈发重视。^⑧在国民政府对侨务加强管控的背景下，闽澳华侨赈济会在形式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赈济会的领导人徐伟卿、梁彦明就曾向国民政府侨务处长、国民党澳门支部常委周雍能商榷赈济对策；^⑨赈济会的筹款提案亦会向中赈会、省赈会备案。^⑩国民政府也为澳门救济活动提供援助，如1940年3月11日，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向澳门电汇5万元，用作难民救济经费。^⑪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的中央赈济委员会派委员杜镛访问澳门，特拨援

① 《闽澳华侨济难会章程》：《华侨报》，1940年3月12日，第5版。

② 《华侨赈济会计划 疏散少壮难民》：《华侨报》，1940年4月8日，第5版。

③ 从1940年4月16日到5月5日，《华侨报》分别报道了8次“闽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说明闽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进入总结与收尾阶段。

④ 《本澳各收容所 难民渐减》：《华侨报》，1940年4月22日，第5版。

⑤ 《十日以前疏散难民》：《华侨报》，1940年6月3日，第5版。

⑥ 《澳侨纷回市营业，据谈澳门前山车日内恢复，莺燕三十余口应聘回省》：《中山日报》（汪系），1940年6月8日。

⑦ 《闽澳华侨赈济会结束后 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继续接办》：《华侨报》，1940年6月25日，第5版。

⑧ 关于国民党增设海外部的基本决议，《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刘维开：《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7—88页、第111—112页。

⑨ 《全澳侨胞今日假座商会 商讨救济难民办法》：《华侨报》，1940年3月8日，第5版。

⑩ 《赈济会昨议决维持难胞生活 请各方继续捐助》：《华侨报》，1940年4月29日，第5版。

⑪ 《李主席汉魂轶念中山难民 拨五万元施行急赈》：《华侨报》，1940年3月11日，第3版。

款国币一万元，^①为闽澳华侨赈济会提供了经济支持。

相较于国民政府的支持态度，澳葡政府的态度显然暧昧。澳葡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愿意开放边界，给予中山难民政治庇护，还督促中华商会、镜湖医院、同仁善堂等华人团体组织救济工作，主动承担难民收容区域的治安维护工作。^②但澳葡政府在维持澳门“中立”的孤岛地位的同时，^③迫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压力，一方面将国民党驻澳门支部驱逐出境，^④另一方面发布政令，禁止户外筹款和宣传活动，只允许户内以非公开方式筹集善款。^⑤严禁华人团体以“抗战”“救国”等名义开展活动。在紧张的氛围下，澳葡总督猜忌“济难会”之“难”与“国难”有密不可分关联，勒令闽澳华侨济难会改名“闽澳华侨赈济会”。^⑥在救济难民过程中，闽澳华侨赈济会摸索着澳葡政府的底线，在夹缝中求生存。

（三）救济成效与贡献

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下，闽澳华侨赈济会发挥“总务”“财政”“劝募”“宣传”“管

理”“卫生”部门化优势，实施推进多方面工作：（1）总务组登记每日难民数量，发放难民证，实现难民的标准化管理。^⑦（2）据《工作总报告（八）》显示，财政组透过个人、社团等渠道筹集善款，在1940年3月8日到4月11日总计收到港币捐款4623.32元、毫银16 655.9元、大洋131 394.6元、毫券2143元，换算为毫银，合计收取69 841.08元援款，为救济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⑧（3）劝募组印制捐本1000册，深入社区，开展沿街劝捐活动，发放捐本436册，^⑨调动了民众募捐的积极性。（4）管理组负责配给物资，维持收容所秩序，营造了良好的难民营环境。（5）宣传组撰写救济工作日报，在澳门各大报社刊登，定期将工作概况汇总，请香港报界公会、新亚通讯社转送香港各报章发表，^⑩在赈难救亡运动中发挥了救济宣传、表彰先进、鼓舞士气的作用。（6）卫生组组建医疗团队，驻扎难民营，为难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⑪还定期采购常用药品，分发给难民，缓解了难民病患的燃眉之急。^⑫

① 《中振会第九救济区函》：《华侨报》，1940年3月18日，第5版。

② 《石岐沦陷后之澳门动态》：《中山日报》（汪系），1940年3月12日。

③ 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Arquivo Consulado de Cantao, M116. 吴志良等：《澳门编年史》第5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06-2507页。

④ 《淪国民党澳门支部被当局驱逐出境，盲目抗战惟有自取灭亡》：《中山日报》（汪系），1940年3月24日。

⑤ 林发钦、王熹编：《孤岛影像——澳门与抗日战争图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⑥ 《商店学校义卖义赛筹赈 大会继续收到各方捐款》：《华侨报》，1940年3月15日，第5版。

⑦ 《赈济会昨议决定定期召集各侨团开会商筹款办法 各所管理员津贴由各常委担》：《华侨报》，1940年3月25日，第5版。

⑧⑩ 《闽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八）》：《华侨报》，1940年5月5日，第5版。

⑨ 《闽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七）》：《华侨报》，1940年4月30日，第5版。

⑪ 《各医生义务诊症》：《华侨报》，1940年3月19日，第5版。

⑫ 《民族扫墓节 昨虽天气晴朗 惟踏青者极鲜》：《华侨报》，1940年4月6日，第5版。

澳门华侨赈济会致力于难民收容工作。据伪《中山日报》^①和广东省政府^②估计，1940年3月前往澳门避难的灾民超过2万人，其中约有1.2万人接受了澳门华侨赈济会的救助。澳门一开始只有镜湖医院、莲峰庙、观音堂三处难民

安置地，^③大批难民居无定所，露宿街头。澳门华侨赈济会成立后，在裕安丝工厂、渡船街等地设立难民营。截至3月23日，难民营数量达11个。如表1显示：

表1 1940年3月13日与3月23日收容所数量及收容人数对比表

1940年3月13日收容所名单	收容人数 ^④	1940年3月23日收容所名单	收容人数 ^⑤
镜湖医院	1800余人	第一收容所	1008人
观音堂	1300余人	第二收容所	1469人
莲峰庙	870人以上	第三收容所	1347人
裕安纱厂	1000余人	第四收容所	402人
妈阁庙	300余人	第五收容所	437人
包公庙	300余人	第六收容所	426人
无住宿者	超过1000人	第七收容所	169人
		第八收容所	1578人
		第九收容所	433人
		第十收容所	440人
		第十一收容所	800人
		未有编及滞留本乡公所租屋、租艇者	4000余人

资料来源：《华侨报》。

如表1所示，至1940年3月23日，11个收容所共计接纳近万名难民。虽然仍有4000多名难民散落澳门各地，但都稳定接受澳门华侨赈济会的膳食补助。随着后续澳门华侨赈济会的新难民营竣工，更多难民得到安置，难民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二、百川归海：澳门社团运作下的资源供给

澳门华侨赈济会作为“救亡赈难社团”的特殊定位，决定了其在救济实践中发挥着提供“联动框架”的重要功能。但能否实现救济目

① 《日军占领中山县城，澳粮食租价骤涨，情形极混乱》，《中山日报》（汪系），1940年3月9日。

② 《李主席汉魂軫念中山难民 拨五万元施行急振》：《华侨报》，1940年3月11日，第3版。

③ 《难民大增》：《华侨报》，1940年3月10日，第5版。

④ 《食宿俱无 难民亟待振济》：《华侨报》，1940年3月14日，第5版。

⑤ 《难民众多赈款有限 请侨胞尽力捐输》：《华侨报》，1940年3月23日，第5版。

标,则取决于作为资源输送方的华人社团的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

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指出,正常的社会组织会形成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的层级结构,中层组织有着联络上下的广泛社会渠道和网络优势,更容易开展社会动员工作。^①在澳门的特殊社会政治条件下,澳葡当局在华人社会的基层治理上采取“华洋分治”的策略,奠定了华人社区自治的社会格局。^②黄雁鸿分析澳门同善堂时也指出,澳门形成了“政府—组织—个人”的互动框架,^③以各类华人社团为代表的中层组织扮演着协调澳葡当局、基层民众关系的重要角色,占据着大量社会资本。

澳门特殊的社团生态在抗日战争爆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催化下,展现出良好的组织韧性,不仅在中山难民涌入之初,率先展开施救活动,镜湖医院、中华总商会等老牌社团更是发挥全澳范围的影响力,邀请全澳侨胞汇聚澳门商会,公开商讨救济对策,筹建“闾

澳华侨赈济会”。^④从社团角度出发,“闾澳华侨赈济会”与其说是独立的中枢决策机构,毋宁说是原生社团组建的“临时性赈难机构”^⑤。闾澳华侨赈济会按照近代商会^⑥的形式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全部为澳门华人社团与商界精英。在澳门华人圈内妇孺皆知、底蕴深厚的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同善堂、中华教育会、中华妇女慰劳会,松散的报业界,以及在澳门创社不久的中央国医分馆^⑦,救济中山难民过程中成立的中山同乡济难会组成的八大团体,在执委会中分占五个席位。^⑧以米业行、车衣行为代表的56个行商及各校校长则分占两个席位。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徐伟卿担任了闾澳华侨赈济会主席,^⑨中华教育会的创始人梁彦明担任副主席。^⑩

澳门华人社团在整合救济资源,组建“救亡赈难团体”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赈难救亡运动。总体而言,华人社团主要通过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或直接捐输物资的方式参与救济活动。^⑪但由于1939年底以后,澳葡政府

① Halebsky, Sandor. Mass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林广志:《澳门之魂: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7-536页。

③ 黄雁鸿:《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4页。

④ 《全澳侨胞今日假座商会 商讨救济难民办法》:《华侨报》,1940年3月8日,第5版。

⑤ 冯翠:《抗日战争专题研究:抗战中的澳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53页。

⑥ Zhongping Chen, *Modern China's Network Revolutio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⑦ 中央国医的澳门分馆成立于1930年。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5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3页。

⑧ 《推定各界领袖百余人为执行委员 今日召开会议选举主席进行工作》,《华侨报》,1940年3月10日,第5版。

⑨ 《闾澳华侨济难会 昨举行执委就职典礼 随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组织章程 选出常委徐伟卿、黄叔平为主席 即席捐款认捐踊跃达万元》,《华侨报》,1940年3月11日,第5版。

⑩ 吴志良,姜胜华,何伟杰:《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八卷:革命、战争与澳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4页。

⑪ 林发钦等:《澳门人的抗战》,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第26页。

强化对华人报刊的舆论监督，华人新闻界有关“抗日爱国”的报道趋于冷寂，^①华人社团便将注意力集中于难民救济工作上。在大批中山难民滞留澳门期间，澳门华人社团发挥了原生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从多方面为难民提供帮助。最普遍的赈助方式是捐款，如1940年3月11日的劝募活动中，银业行捐款1500元、首饰行捐款500元、生果行捐款1000元、理发行捐款200元、中山济难分会捐款2000元、木业行捐款298元，^②合计捐资金额近5000元。除捐款外，还有不少社团选择用捐输物资的方式来帮助难民。如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在1940年3月，援助难民阿司匹灵1000粒、回春丹50粒、六神丸10盒、平安茶10盒、通关油2打、见连丸500粒、痾呕散100樽、保婴丹10粒、发冷丸3盒、药棉1包、灰孟养1樽，同善堂也赠予难民霍乱痾呕散20瓶，^③为难民提供了大量急用药品。澳门中华公教济贫会则通过闾澳华侨赈济会，向难民捐赠面包一万多枚。^④

在救济难民过程中，不少社团发挥自己的专长为难民提供服务，如镜湖医院发挥医疗优势，抢救了许多伤病难民，还为不少孕妇接生。^⑤新成立的澳门学生救济委员会，则集中力量救护学生，租借三艘大船，专门收容避难学

生，还给学生发放饭券，供给膳食。^⑥还有同善堂等社团，关注难民衣食问题，从传统荒政中汲取经验，不仅向难民施粥，^⑦还为难民提供棉衣等生活用品。^⑧

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同善堂和中华教育会等老牌社团，社会资源丰富，其不仅筹集集物，解决难民的日常需求问题，还致力于为难民提供暂居地。据1940年4月17日到5月5日发布的8份“闾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显示，上述社团齐心协力，给流落街头的200多名难民提供了居所。^⑨其中，镜湖医院在难民涌入后，第一时间开放院内宿舍，在3月8日到4月11日之间，为982名难民提供了暂居地。^⑩

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澳门华人团体向难民雪中送炭的义举，不仅是对闾澳华侨赈济会救济工作的有力支持，缓解了难民的燃眉之急，还化关爱为希望，让难民重获生存希望。

三、众志成城：澳门民众的日常救助及香港的外部援助

澳门民众在大批中山难民涌入时，自觉从传统的“仁义”观念中汲取智慧，用“谋利济贫”或“以工代赈”的方式援助难民。同时，

① 陈敏，夏泉：《抗战时期澳门华人的家国情怀表达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106-117页。

② 《闾澳华侨济难会昨举行执委就职典礼 随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组织章程 选出常委徐伟卿、黄叔平为主席 即席捐款认捐踊跃达万元》：《华侨报》，1940年3月11日，第5版。

③ 《闾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一）》：《华侨报》，1940年4月16日，第5版。

④ 《昨日陆续收到各界捐款一批 高可宁认捐巨款国币二千元》：《华侨报》，1940年3月16日，第5版。

⑤ 《闾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四）》：《华侨报》，1940年4月23日，第5版。

⑥ 《救济失学难生》：《华侨报》，1940年3月16日，第5版。

⑦ 《善长仁翁速起急赈 莲峰庙观音堂镜湖医院已无地可容 殷商黄汉兴高可宁均分日举行施粥》：《华侨报》，1940年3月7日，第5版。

⑧ 《同善堂增办各善举》：《华侨报》，1940年3月29日，第5版，本埠新闻·体育与教育。

⑨ 《闾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三）》：《华侨报》，1940年4月18日，第5版。

⑩ 《闾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七）》：《华侨报》，1940年4月30日，第5版。

香港民众也挺身而出，促成港澳联动，共同推进救济工作的开展。汪然的《放赈急救条议》指出，正是孟子强调的“恻隐之心”凝聚起人心，^①架起扶危济困之桥，给受难者带来光明与希望。

（一）谋利为义：澳门商界与群众的筹款活动

中山蒙难，生灵涂炭，大量难民涌入澳门之时，澳门各民间社团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全力支持赈难救亡工作。澳门华人民众响应阖澳华侨赈济会的号召，用多种多样的方式筹集资金，帮助中山难民渡过难关。各界民众因财力有限，难以“一掷千金”，所以往往要通过“谋利而赈”的方式筹募善款。集资活动一般“义字当头”，以“义卖”为主要形式。如咀香园饼家就以店铺为单位，开展义卖活动。^②另有旅行业^③、丝发匹头行^④的众多公司，发挥行会的联动作用，发起义卖活动，将所得善款汇总到阖澳华侨赈济会，体现了从“点”到“面”，由“个人”到组织的资源汇管道道的通畅性。

“义卖”也演变出了多种多样的“变体”形态，丰富了澳门募款义捐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但不限于：（1）义演。该风潮起自雨芬中学、南海联中的联合表演，^⑤后来学余剧艺

社发扬内地1930年代兴起的“爱美剧”业余话剧的思路，在岗项大戏院“义演”果戈理的名著《视察专员》，筹资救助失学青年，大获好评。^⑥（2）义影。国华影院在院线上映溜冰歌舞片《白雪天使》，将片租以外的收入半数捐送阖澳华侨赈济会，其余半数捐给澳门学生救济会。^⑦（3）义赛。复旦中学和香港星岛队举办篮球义赛，将义赛所得的500元捐给难民。^⑧（4）义擦。李桂全等39名擦鞋工从4月6日到4月7日面向全澳市民举行“义擦”活动，将所得收入的七成上交阖澳华侨赈济会。^⑨上述活动不仅彰显出澳门1940年难民救济活动参与群体的广泛性，还凸显出澳门华人群众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以“技”济困：身体力行者的救济义举

不仅有许多人以“谋利为赈”的方式救济难民，还有人凭一技之长，身体力行地为难民服务，如濠江女子理发店的理发师就自告奋勇，为难民“义剪”。^⑩其中，伍凤鸣、何少琼、廖有群等理发师还坚持“义剪”到4月10日，^⑪展现出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精神品质。

中山难民来澳门避难时正值春季，传染病多发，又由于人口频繁流动且密度过大，难民

① 汪然：《放赈急救条议》，《华侨报》，1940年3月9日，第5版。

② 《吁请各界努力劝捐 传德荫个人捐国币万元》：《华侨报》，1940年3月21日，第5版。

③ 《本澳电灯公司司理 嘉理仁热心可敬 捐助华侨赈济会西纸五百元》：《华侨报》，1940年3月22日，第5版。

④ 《各界努力捐输 丝发匹头行踊跃》：《华侨报》，1940年3月26日，第5版。

⑤ 《雨芬中学上演改期 南海联中筹备演剧》：《华侨报》，1940年3月30日，第5版。

⑥ 《演名剧筹款救济学生 本月六七两日在岗顶戏院演〈视察专员〉》：《华侨报》，1940年4月3日，第5版。

⑦ 《国华影戏院今日义影请各界踊跃购票》：《华侨报》，1940年3月29日，第5版。

⑧ 《篮球义赛 结果完满 星岛队大胜复旦 收入约五百余元》：《华侨报》，1940年4月15日，第5版。

⑨ 《擦鞋童子热心可嘉 义擦筹款振难民》：《华侨报》，1940年4月8日，第5版。

⑩ 《濠江女发师报效为难民修发》：《华侨报》，1940年3月22日，第5版。

⑪ 《继续义剪》：《华侨报》，1940年4月9日，第5版。

营环境恶化，瘟疫比往年更加猖獗。^①为整治卫生环境，裕安丝厂的司理谢保明率先向医院求助，请吴善施医生前往收容所，免费给难民接种牛痘。^②同时，不少医德高尚的医师应澳门华侨赈济会的邀请，以“义诊”之名，每日驻守难民营，为难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些医师任劳任怨，不求回报，而且医术精湛，治愈了大量患病难民。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至1940年4月1日，各收容所的“义诊”医生累计治愈患者506名，为难民营的医疗卫生状况改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跨域协作：香港华人对澳门赈难活动的支持

港澳两地隔海相望，交通便捷，日军攻陷中山以后，有许多中山县难民辗转澳门，乘船逃往香港。《华侨报》在1940年3月11日发布

公告提醒往港中山难民乘船需携带20元港币，不然无法过境，从侧面反映出逃港难民数量不少。^③香港爱国同胞不忍看到中山难民滞留澳门困难重重，食不果腹，纷纷向澳门汇寄善款，接济受难者。该时期，《华侨报》关于香港驰援澳门的报道出现14次，^④具体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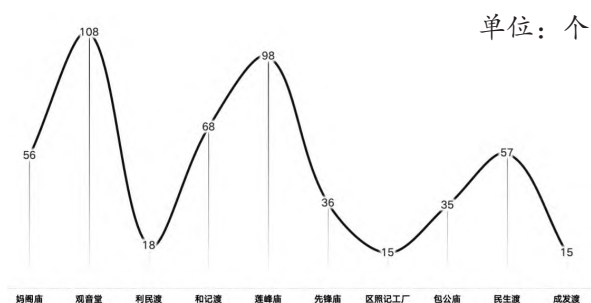


图1：截至4月1日的澳门各收容所医疗救援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华侨报》^⑤。

表2 《华侨报》中有关香港支援澳门赈难救亡运动基本情况表

主要的赈难组织	赈难时间	赈难物资内容
香港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	1940年3月8日	国币100 000元、饼干3000磅、药品一批。 ^⑥
本港东区商人吴威波	1940年3月21日	饼干14大袋，药品一大批。 ^⑦
觉先声剧团、沙岗队	1940年3月24日	港币一元二毫陆仙、毫银九元六毫、大洋三元七毫、毫券一毫、铜仙六百零五枚。（小型足球赛义赛所得） ^⑧

① 《澳门难民拥挤 粮食饮料均闹荒 人烟稠密发生春瘟天花等症死亡颇重 侨民难民纷纷返省》：《中山日报》（汪系），1940年3月14日。

② 《香港美商将集议 募款救济中山难民》：《华侨报》，1940年3月13日，第5版。

③ 《中山难民往港注 每人需备港币二十元》：《华侨报》，1940年3月11日，第5版。

④ 含在港美商的援助报道。表2主要呈现的是在港华侨同胞的驰援记录。

⑤ 《华侨赈济会收入 捐款总数共双毫六万余元 除支出二万余元尚余三万余元》：《华侨报》，1940年4月1日，第5版。

⑥ 《港中山商会拨巨款》：《华侨报》，1940年3月8日，第5版。

⑦ 《香港侨胞热心救难》：《华侨报》，1940年3月21日，第5版。

⑧ 《香港四妇女侨团代表 昨抵澳振慰难民》：《华侨报》，1940年3月24日，第5版。

(续表)

主要的赈难组织	赈难时间	赈难物资内容
香港女青年会、香港妇女新生活运动会、香港女兵灾会、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	1940年3月24日	国币2000元。 ^①
侨港中山隆镇同乡会	1940年3月27日	国币500元。 ^②
香港洋酒伙食界	1940年3月28日	白米100包。 ^③
香港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	1940年3月28日	保济丸133盒、发冷丸500瓶、保心安膏143盒、保心安油1160盒、什药2包、棉衣3包、旧衣30包、牛奶6箱。 ^④
本澳香港中国国货公司	1940年3月31日	捐款双毫100元，另捐出3月31日到4月4日收入总数的10%。 ^⑤ 据后续报道，总共捐赠毫银300元。 ^⑥
香港红十字会	1940年4月4日	港币500元。 ^⑦
香港华商总会	1940年4月12日	大洋2000元。 ^⑧
香港鸡鸭行总会	1940年4月12日	白米200包。 ^⑨
香港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第二次捐赠）	1940年4月17日	大洋10000元。 ^⑩
香港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	1940年4月17日	港币1000元。 ^⑪
香港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第二次捐赠）	1940年5月2日	港币1000元。 ^⑫

① 《香港四妇女侨团代表 昨抵澳振慰难民》：《华侨报》，1940年3月24日，第5版。

② 《大会谢隆镇同乡会》：《华侨报》，1940年3月27日，第5版。

③④ 《港澳侨团热心救难 源源接济难民》：《华侨报》，1940年3月28日，第5版。

⑤ 《澳门香港中国国货公司 今卖物筹赈难民》：《华侨报》，1940年3月31日，第5版。

⑥ 《中国国货公司义卖成绩》：《华侨报》，1940年4月6日，第5版。

⑦ 《香港红十字会捐助港币五百元》：《华侨报》，1940年4月4日，第5版。

⑧ 《香港华商总会捐款 赈济难民 国币二千元拟交赈济会代振》：《华侨报》，1940年4月12日，第5版。

⑨ 《港鸡鸭行总会代表慰问难胞》：《华侨报》，1940年4月12日，第5版。

⑩ 《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 捐助赈济会巨款》：《华侨报》，1940年4月17日，第5版。

⑪ 《昨代表黄绍蕃由港携款来澳 香港赈联会亦汇捐港币千元》：《华侨报》，1940年4月17日，第5版。

⑫ 《香港赈联会 助赈济会 港币千元》：《华侨报》，1940年5月2日，第5版。

(续表)

主要的赈难组织	赈难时间	赈难物资内容
香港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第三次捐赠）	1940年5月12日	国币30000元。 ^①
香港药行商会	1940年5月14日	十灵油1000樽、辟疾灵497盒、肥儿疳积散120樽、头痛丹120包、疟症丸199樽。 ^②
商业通济公会	1940年5月14日	保济丸150包、保心安油250樽。 ^③
新世界药房	1940年5月14日	救急止痛丹500樽、济众水239樽、志远油242樽。 ^④
李众胜堂	1940年5月14日	保济丸300包，另捐港币350元。 ^⑤

资料来源：《华侨报》。

由表2可见，参与筹募的港侨人士行业遍及医药界、妇女界、文艺界、政商界和同乡会，捐赠形式也丰富多样，药品、衣物和食品一应俱全，为滞澳难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资。1940年港澳联动救济中山难民的历史事实，是抗日战争时期港澳地区抗日爱国运动的缩影，既彰显了港澳与内地人民之间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又凸显了港澳地区“特区抗战”的独特路径。

四、结论：在赈难与国难之间

在民族大义和人道关怀的驱动下，港澳同胞历经澳葡当局限制、日军物资禁运与武力威慑的重重考验，担荷起祖国抗战“后方堡垒”^⑥的重任，在“战场”之外开辟出爱国救亡的另一种道路，挽救了大批难民的生命，以独特方式为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莫美春)

① 《拨三万元 助澳华侨赈济会 经派员携款到澳》：《华侨报》，1940年5月12日，第5版。

②③④⑤ 《香港钟声社捐送一大批药物》：《华侨报》，1940年5月14日，第5版。

⑥ 澳门华商高可宁于1939年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写下的题词。傅玉兰：《抗战时期的澳门》，澳门：文化局澳门博物馆，2001年，第104页。